



CHINA NEWS DIGEST — CHINESE MAGAZINE (CND—CM)

• — • — •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(CND) 主办 • — • — •

—— 增刊 第四三〇期 ——
(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版)

本期目录 (zk0504e)

【追寻真相】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	高伐林
【史海钩沉】极左的中共“九大”	迟泽厚
【史实辨析】不应有的遗忘	何 蜀

小启：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参观。

文革博物馆》网址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

欲订阅本刊《文革博物馆通讯》请致函 cnd-info@cnd.org 获取订阅资讯。

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@cnd.org。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。

【追寻真相】

金秋与丁凯文谈重审林彪事件

• 高伐林 •

8月14日下午，《重审林彪罪案》的主编丁凯文先生，与美国弗吉尼亚州 Old Dominion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、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将军的女儿金秋教授，应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资讯中心之邀，就关于重新审视林彪问题举行演讲并回答听众的提问，会场出现一座难求的盛况，听众踊跃提问，气氛十分热烈。

“文革”伊始林彪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并载入中共九大党章，1971年，他突然与妻子和儿子乘飞机出走，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。死后他被控“篡党夺权”“企图暗杀毛泽东”“叛党叛国”。这一事件震动之大，连毛泽东本人都大病一场；这一事件疑团之多，33年来各种传言时起时伏，至今人们仍猜测不已。

丁凯文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后，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。来美国后对林彪事件投注了很大心力，他主编的《重审林彪罪案》一书，刚由明镜出版社出版。金秋教授的父亲吴法宪被视作林彪集团主要成员，在“九一三”事件后被当局拘捕审查，1981年被判刑17年，她本人也为此受株连而被送往远郊农场“劳动改造”。“文革”后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读完本科和研究生，后获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

学位。她也是在出国之后开始研究林彪事件的。

多维记者心远整理了他们的演讲和问答录音稿，并交丁凯文先生作了必要的修订。

丁凯文：非常感谢有这么很多朋友来这里听我们就林彪事件做一个演讲。记得去年五月份，我就坐在这个演讲台下面，听高文谦先生做关于晚年周恩来的演讲。当时我心里有个感慨：这么多人在研究周恩来，研究刘少奇，研究邓小平，研究毛泽东，出了这么多的书，到书店里随便看看，有关他们的书实在多得很。但是有关林彪的书却基本上没有——也不是完全没有，然而有的是什么呢？我手上就有这一本《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》，还有这一本《人物春秋》杂志所编的《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报告》——所有这类的书，都是照中共官方口吻，对林彪事件做一个解释。有没有与官方观点相左的书呢？我来看去看，至少中文书我没有看到，英文书有金秋教授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权力的文化》，还有孙万国教授与Teiwes合著的一本《林彪的悲剧：文革中骑虎难下》。此外，倒是有不少戏说、野史，像姚明理的《阴谋与林彪之死》之类。总之，真正从历史角度研究“九一三”事件的著作，很少。

从去年听高文谦先生演讲晚年周恩来之后，我萌发了一个念头，对林彪事件这一个课题，应该小结一下成果，考察一下官方所说的是不是事实？给林彪及其手下所定的罪名是不是真的存在？通过我自己对历史的探讨，以及与一些学者交往讨论，我发现林彪事件中有很多东西需要重新研究分析。

经常有人问：为什么你对林彪事件这么感兴趣？“九一三”事件过去了33年了，“文革”结束到现在也有28年了，这么长时间里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“文革”中定的大案要案几乎没有一个没有被推翻、没有一个没有被重新评价的，惟独林彪事件不许重新评论。不仅如此，在1980、1981年的审判中，把林彪从“反党集团”升格为“反革命集团”，把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本来是完全不同的集团，拼凑到一起来审判。用的定案材料仍然是当年专案组“逼供信”那一套制造出来的伪证，放在林彪头上——诸如什么“反党夺权”之类，基本上还是在原来当局所定的那个圈子里。

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应该从新的视角来审视林彪事件。

一提重新评价林彪事件，有人就要问：你们是不是要翻案？在林彪问题上，一有不同观点，不同看法，就有人特别敏感。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，对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，你有你的观点，我有我的观点，哪一种更接近事实、真相，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。在大陆恰恰不准许这种讨论，禁止与官方观点相左的解释，以至于在国内的研究非常困难，我们只好将这种研究拿到海外来，把我们能够找到的新的文章、新的证据，新的观点集中起来。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初衷。

还有一点需要说明：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。例如王年一教授认为，林彪出走，是毛泽东逼的，毛在南巡讲话中不断施加压力最后导致林彪被逼出走；而陈晓宁先生则认为，林彪“九一三”出走，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是被毛和周逼走的。再如陈小雅女士与金春明教授对毛泽东1966年给江青的信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这封信对于我们理解林彪事件有比较重要的意义，把他们的文章放到书里，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要给林彪翻案。我们今天来演讲，也不代表所有作者，我现在的发言只代表我自己。

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。这本书分了七个部分——

第一部分是从总体上讲怎样重新认识林彪事件；

第二部分探讨所谓“林彪战备一号令”的问题，这个“一号令”究竟是不是要搞“反革命政变”的“预演”？

第三部分是讨论所谓“设国家主席”的问题——这是毛泽东南巡当中给林彪最大的一顶帽子，说他要设国家主席，就是自己要当国家主席，还将这一条定为林彪他们的“政治纲领”。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、有没有可能性？我们在书中有比较生动深入的探讨。

第四部分，林彪有没有参与政变？有没有派自己的儿子策划暗杀毛泽东的阴谋？

第五部分是关于林彪“叛国投敌”的问题。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，是不是坐飞机跑掉了，就意味着叛国投敌？

后面还有两个部分，第六部分是关于“文革”当中林彪事件的思考，像林彪在1970年“庐山会议”上的言行，在天安门上的许多一些讲话等等应该如何看。

第七部分是关于林彪事件的影响，这中间就包括金秋教授的文章，还有一些作家采访“九一三”事件中像服务员、司机、飞机机组人员这样的小人物，后来受审查的遭遇。

书的最后，还附上了林彪在“文革”中的大事记。

书的篇幅是很长，上下两册，有一千多页。我希望这本书给大家一个新的视野，推动对林彪的研究，以至于“文革”史的研究；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“文革”这场浩劫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林彪“九一三”事件。重新来认识“九一三”事件和林彪事件，乃至重新认识文革史、重新认识毛泽东以及中共的制度。

金秋：首先感谢纽约皇后区图书馆，感谢出版了《重审林彪罪案》的明镜出版社何频先生，感谢丁凯文先生唤起公众重新讨论林彪事件的努力。

自从1989年我来到美国以后，我一直在从事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。在我的英文版书出来以后，我曾经在美国和国内一些单位做过讲演，但今天我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听众，用中文来对林彪事件进行探讨。有这么多人来听我们的讲演，对林彪事件表示关注，我心里很激动，也充满感谢。

我也很佩服有那么多学者不顾自己个人利害，坚持从事林彪研究。我的身份大家都知道，我陷到这个事件的研究中，没有办法，想出也出不来了；但是那么多与他们自己个人没有太多关系的学者，却冒着非议坚持探索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我很感谢他们。

《重审林彪罪案》这本书，对于林彪研究，确实是很大的推动。书里汇集了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林彪事件上的辛勤劳动成果，他们文章的基本态度都是很严谨的，都是站在历史和学术的角度来探讨林彪。我对于这本书的贡献很小，主要是丁凯文先生他们的努力。我在里面只有一篇短文，而且这篇短文也是丁凯文先生翻译成中文的。

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把它留到后面回答提问时，来针对最关心的话题来讨论。这里想先讲一个框架——讲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。

重复陈述林彪事件实际上没有太大必要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太熟悉不过了。我今天讲的是，应该如何研究林彪事件？我的演讲如果要安个标题，标题可以这么定：“历史不是‘案’”——案，是案例的案，立案、翻案、定案的案。

正像刚才丁凯文谈到的，一提到林彪问题，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：对林彪怎么定案，是不是牵涉翻案？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，要说的是，历史本身并不是一个“案”，不可能做出一个唯一的结论。那种做法就是政治，而不是历史了。

林彪事件非常复杂，牵涉到非常多的方面，政治与历史很难在林彪事件上加以区分。到目前为止，许多人还是把林彪问题看成一个政治事件，上来首先就问，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林彪是否有罪？然而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，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。历史关注的是，在过去某一个时期，发生了什么？

怎么去评价林彪事件，会掺杂很多政治因素在里头——林彪事件本身是一个政治事件。在1971年的时候，林彪事件引发了中共建国以后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，当局面对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危急局面。经历过林彪事件的人都记得，当局是怎样向全国公布林彪事件的：是经过了很多一段时间——从高层到基层，从党内到党外，时隔将近一个月，高层才研究出统一口径下达文件向党内作出说明。实际上，官方当时从来没有正式向外界公布过林彪的死亡，只是内部用文件传达。

说林彪事件是个政治事件，还因为它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的命运。将一个政治事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，这个转化的过程会有很大的困难，遇到很大的阻力。这是因为林彪这个名字与“文革”的联系太紧密了，林彪与“文革”有这种扯不断、理还乱的关系，一提到林彪，你不能不提到“文革”；一提到“文革”，你不能不提到林彪。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我们都知道，确实是一场十年的灾难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数字，说明到底有多少人在“文革”中丧生。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，对“文革”中的死亡事件做了研究。有人说这个丧生人数很惊人，达到几百万，有人说数字没有那么大，争论不下；但是在“文革”中受到牵连的中国人，至少达到一亿以上——十分之一，甚至更多的中国人，经历过受迫害、受株连、倍受压抑的岁月。如果有“文革”诉苦会，每个人都能谈出自己在“文革”的一段悲惨遭遇。换句话说，这也就是说，林彪与这么多中国人的“文革”经历有关系。既然林彪事件使这么多中国人的命运受到影响，不能没有个说法，不能不对老百姓有个交代：为什么会有这场“文革”，“文革”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错在哪儿？

最方便的，就是用林彪来解释了：林彪是个坏人，是个奸臣，“文革”是因林彪而起——不光是林彪，是林、江两个集团要对文革负责。

自从我研究林彪事件，人们只要知道我的身份，就会问我怎么看。“文革”中的个人恩怨实在太多了。我过去比较低调，一直没有怎么用中文写作，我尽量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，而不是以当事人、受害者身份出现，尽量脱离个人的角度——如果我永远脱离不了个人的角度，我永远成不了一个好学者，学者要从个人亲身经历中“拔高”出来。只是最近丁凯文先生翻译了我那篇文章放到网上，在我的文章中提到受林彪事件牵连的这批人受过多少苦，社会上马上就有反应，有人说：现在连林彪这批人都要喊冤了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被林彪整过的人怎么办？你说你爸爸被整过，那我爸爸是被你爸爸整的呢！（众笑）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儿！

每次一提到林彪问题，就会出现这类令人难堪的质问。我觉得很悲哀，我们能不能更加心平气和地探讨？是否能够站在超脱一点的立场来？如果我们永远站在个人恩怨的立场来看，你的爸爸整了我的爸爸，我现在再来整你……就没有办法从事研究。

有人问，站在历史角度来看林彪事件，怎么看？这就又牵涉到：什么是历史？国外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，中国人对“什么是历史”有特定的看法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希望对历史要有个所谓“正确”“不正确”的确定说法。

我出国以后经受了历史学研究的训练，感到西方史学界的很多看法很值得我们借鉴。历史是一门科学（或者说，很多历史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门科学），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，它并

不是静止的。而中国人一切都太政治化了，我们太习惯政治化了，一切都以政治的标准去划分，把历史人物划分为红脸、白脸，好人、坏人，这是一种很有缺陷的研究方法。历史不是按照好人坏人来划分的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非常复杂的，好人有坏的一面，坏人有好的一面，只要是凡人，都会做一些好事，也会做一些坏事，世上不存在毫无缺点的圣人——对“圣人”的概念，我们应该打破了。我在对林彪做研究的时候，也在试图打破，但这个问题太敏感了。

我写过一篇文章，讲正史和野史的关系。什么是正史，什么是野史？官方编纂公布的或者通过历史学家说出经过官方认可的历史，就是正史，中国传统上是由皇家来钦定的。除此以外的就是野史。野史有没有价值呢？野史往往是那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写出的东西，列不进正史，就只能算野史。

林彪事件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个问题。我正在看着一个事件的演变过程：它怎么由刚刚发生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慢慢演变成历史。从事件发生演变成历史，到底是什么因素起作用呢？个人的经历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？关于林彪事件的官方公开的定论，大家都太熟悉不过，但是亲身经历的人，从目击者的角度又怎么看林彪事件呢？不得不承认，他们的看法与官方认可（我尽量不用敏感的词汇）的历史，确实有很大的差距。

在官方认可的历史与个人经历的记忆这两个层次之间，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，就是公众经历的林彪事件，大众怎样记忆林彪事件。还有第四个层次——加上史学家。至少有四个层次的历史在竞争，至于说哪个层次的看法能够成为后世（譬如说五百年后的后人）所知道的历史，我可就不知道了，很难预测。

我们多年来，一直在追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出来以后，在夏威夷大学呆了六年，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写林彪的。1995年，我写完我的博士论文，1999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，之后我就开始进行更深、更高层次的分析：如果将林彪事件作为历史事件来研究，是否可以做多元化的研究？不是一言堂，而是多元化。现在我还是关注林彪事件，但我是从一个更深、更高层次来看待这段历史，将它作为一个案例，看看正史之外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成分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，不会只有一个真实。我是尽量客观，但是我能不能做到完全客观？不容易。因为我受到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的限制，我虽然希望客观，但我不可避免地会将我的个人看法带进我的研究，也就是说我也不能完全脱离林彪事件的政治性这一面。

如果说我有什么“政治目的”的话，我是想为受林彪事件牵连的人说说话，因为我眼见著这么多的人，因为林彪事件受了牵连，一夜之间便都成了坏人。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多少年，只不过是出于职务或者是什么因素，就被卷入到这场实在是太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。然后就是——不光是——家破人亡。1981年审判的时候内部有个文件初步统计，光是军以上的干部当时被立案审查的就有1000多人，更不要说军以下的干部，更不要说他们广大的家属，受到非人的待遇了。

我在国内时并不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但是出来了，我觉得我必须做这方面的工作，因为这么多人已经都无声了，再也无法为自己说话了，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。

我刚从国内出来就只有一个想法，我就要研究林彪事件。我要发现真相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发现真相。但我越往后研究，越发现，距离真相越遥远。所谓“真相”——deep truth，可能事实上并不完全存在。我不能完全否定史学家要发现真相的这种愿望，但是真相确实要看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允许各种各样的声音去竞争，哪种声音能站住脚，公众自有评论。最后大部分人承认、大部分人接受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一代代传到后世的长远的历史。

我想先讲这么多关于方法的心得，也许我太学究气？我想我们下面会有很多的时间来具体讨论。

（以下观众提问，两位主讲人回答）

问：我们最想知道就是当时的“真相”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金秋：大家想知道林彪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真相——什么叫“真相”？林彪事件，看你怎么定义。我在书里也说了，有广义的“林彪事件”，也有狭义的“林彪事件”。广义的“林彪事件”就是林彪在“文革”中上升一直到与毛产生矛盾，最后他下台，落到很惨的结局；狭义的“林彪事件”，是1971年9月12日晚上，在北戴河发生的什么事情。我叫这个狭义的“林彪事件”为一个“突发事件”，林彪突然出走——我还不能叫他“出逃”，但他确实出走了。

如果你们感兴趣的是这个狭义的“林彪事件”，那么这个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——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阴差阳错，最后导致了林彪家庭决定走。这些不确定因素中，能够出来的真相，这么多年来各个地方各种回忆、资料，都已经出来了；如果有还没出来的，可能也就永远出不来了——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悬案。林彪为什么要走——他的确是要走——他到底是要走到哪里去？你们可能看过张宁女士的书，她对林彪当时的情况做了很多分析，说得比较清楚。在“九一三”之后，当局对所有这些人都做了大“排查”，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所有人都集中起来，每一个人都像篦头发似的，挨个儿回忆交代：几月、几号、几点钟、几分钟，你在做什么？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？“排查”查了几个月，都查不明白。

我现在比较倾向的说法是，狭义的那个“林彪事件”，是一个偶然事件，就是由很多不确定因素造成的。为什么要走？这个比较清楚了；往哪里走？究竟是不是要去苏联？从专案组材料到审判，都拿不出确定的证据来。我在写我的书的时候，也采访了一些当事人，林彪是要叛逃吗？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地说，林彪就是有计划地要叛逃苏联。至少我找不到让我信服的证据。

飞机怎么掉下来的？传说可就太多了。如果要问我个人的看法，我比较倾向于，不应该是打下来的。这么说吧：可能是周恩来曾经表白过——我不记得高文谦的书是否提到过这件事——没有下令打飞机，“如果飞机打下来，反而说不清楚了。”他这倒也是句实话。不打，飞机自己掉下来，可以说他是叛逃；如果是打下来的，那么他到底是被谋害还是叛逃，就会招人猜疑。所以我个人相信没有打。没有打为什么飞机会掉下来呢？我觉得可能是不大说得清了。

有些人坚持相信：档案公开，应该就能够真相大白。实际上了解中共高层政治怎么运作的都会知道，现在该出的材料都出来了，如果没出的话可能就是没有了。也许你可以说我有悲观或“愤世疾俗”吧，我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是有间接的证据：不少东西已经烧掉了，就是说没有了！就算怀疑、推测这些事件中有什么阴谋吧，可能最后要由一些善于演义的人去演义了。

到目前为止，反正我是觉得，也不能说完全不追下去，但是很难很难，有些东西是很难定论的，就是说，很难完全恢复、很难查清所谓的“真相”——就是美国，对暗杀肯尼迪，到现在不也是众说纷纭，下不了结论？

至于广义的林彪事件，牵涉整个“文革”的政治，那又是何等复杂！中国的政治又非常残酷——我们都在海外，拿中国的政治与海外的政治比一比，你就会承认这一点。中国的政治是没有退路的，有进无退，退就是家破人亡。你整我，我整你，我也整了你，你也整了我。这么

多从“文革”、从“文革”前走过来的人，我个人认为，很少有人能够声称自己就是绝对清白，没有说过一句昧着良心的话，没有做过一个损害别人的举动。现在要纠缠谁是谁害的，就永远纠缠不清。我说林彪事件，有人就说，林彪害过罗瑞卿、害过这个那个。我不能说林彪没有参与害过人，但是打个比方吧：当时有十个人发言，现在单单将林彪发言挑出来了，其他人的发言就藏起来了！

我经常被问到一些细节问题。当我回答这些细节的时候，我会感到，我不是在回答某一个具体问题，而是在跟这些问题后面无形的手进行辩论。有人会对我说：“我知道是怎么怎么回事！”与我争论。但我要问：你有没有想过，你“知道”的这些事实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当你说“我听说过”、“我记得”、“我见过”的时候，想一想这些“听说”、“记得”、“看见”的东西的来源在哪里？我不能说你说的就不是事实，但是还有你不知道的、同样重要的事实。有些东西披露了，有些东西没披露，没披露的可能比披露的东西更多，尤其是涉及好人的时候——好人做错了事，不能多责怪嘛。我有时真是很累很累，每次要回答一个关于具体细节的提问，就要将我的整个观念的框架要重复一遍，将我为什么要打破这个东西重复一遍。

问：林彪究竟是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？

丁凯文：刚才金秋教授已经做了回答。在《重审林彪罪案》书里，也有不少文章做了分析，我介绍一下。在书中陈晓宁先生有篇文章说到，林彪的飞机，是在从内蒙飞出国境以后，飞到苏蒙边境的时候掉头往回飞时掉下来的。应该是苏蒙的部队发射导弹之类击伤了飞机，不得不迫降，迫降失败，导致机毁人亡。这是他的观点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，或许能受到启发。

问：请介绍一下林豆豆目前的情况，她的观点如何？

丁凯文：据我所知，林豆豆现在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关系还在那里。生活还不错，身体还可以。再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。

问：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？是谁命令向林彪座车开枪？

金秋：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起的作用，始终是个谜。在中共九大以后直到1971年林彪出事之前，党内其他集团已经都被整下去了，剩下林彪与江青的上海帮集团，是党内最主要的两个集团。这两个集团在九大以后有很多争斗，争斗的高峰，就是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彻底爆发，毛泽东出来支持了江青“上海帮”这一派，林彪这一派大受挫折，不得不做了检讨。从广义的林彪事件来讲，这是个导火索，导致林彪与毛泽东的不和。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作用很难评价，这方面的材料不太多，比较难找，还有待更多的知情人予以披露。不过，我个人判断，在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争斗中，周是比较倾向于林彪的；不光是周，大部分的老师也都站在林这一边——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吧。

现在已经有回忆录披露了：林死了以后，周恩来大哭。他为什么大哭？这是个谜，分析家们各有解释，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周非常悲痛，因为他是比较倾向于林的，兔死狐悲。

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中起的作用，的确是很难讲，但有一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：九一三事件的前期，一直是周在亲自处理，他在接到北戴河那边出问题的汇报后，到底是什么时间向毛做的报告？我了解到有各种说法，有的说：他早就报告了，有的说：是飞机起飞之后才报告的。这些说法不一，也就很难说周当时是否在处理林彪事件中有失误？不过即使有失误，我看也不能怪周：九一三事件，确实是一起让人猝不及防的突发事件，过后为什么那么长久才向大家传达？就是因为实在太突如其来了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局用了很长时间一

步一步地搜集细节，加上解释。

问：为什么在1969年中共九大时毛泽东与林彪关系还挺不错，才过了两年就变得你死我活了？

丁凯文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不错，中共九大时营造的气氛，就是“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”，因为打倒了刘少奇集团，对于毛泽东来说，除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理应营造出一个合作的气氛。

但是在九大之前，实际上已经孕育了毛、林之间的不和了。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，这个“面和心不和”的过程已经开始了。我有一篇文章，谈1970年庐山会议的问题，其中就分析了林彪集团与江青为首的“上海帮”，为什么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。

九大之前，张春桥、姚文元他们就搞了一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，林彪、陈伯达他们搞了另外一个报告的草稿。最后毛拍板决定选用张春桥、姚文元的报告，而林彪当时对这一报告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看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报告的基调。陈伯达的报告，讲的是要搞建设、要发展经济了，而张春桥、姚文元他们，更能领会毛泽东意图的精髓：就是要搞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。这当然是重大的思想分歧。

我们长话短说，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，林彪站出来了。由于他的作用，当时会议上几乎一面倒，要把张春桥打倒。毛泽东不得不出来力挽狂澜，用《我的一点意见》，将陈伯达抛出来当替罪羊——这就是毛林公开决裂的开始。毛想：在“文革”这么大的事情上，林彪竟然跟我不是一条心，而且林彪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，可以左右全会的形势，这么多的中央委员、这么多的政治局委员，都跟着林彪走；如果听任林彪发难，当着毛的面把张春桥真打倒了，那么“文革”的成果还能不能存在？很可能“文革”就此寿终正寝。所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，“掺沙子”，“甩石头”，“挖墙角”（这都是毛泽东当时讲怎么斗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的原话），逼着这些将军们做检讨，毛的用意就是要逼着林彪本人检讨——林一做检讨，就可以照着对待刘少奇那样名正言顺地搞下去了，当时刘就检讨承认犯了“路线错误”，毛正好抓住往下整。

但是林的脾气比较倔强。他对毛泽东的这些措施，软磨硬抗，也不检讨，也不说话，看你怎么办？毛不得已，就去南巡，南巡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打草惊蛇，要轰蛇出洞，要给林彪戴上一顶“篡党夺权”、“谋反”的帽子，“你要设国家主席，就是你要当国家主席”，林彪还有什么路可走？

不管林彪最后是主动走，还是被动走，实际上林都是被毛逼走的。

问：“文革”前林大捧毛泽东思想，与“文革”有什么关系？

金秋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，不用我在这里多讲。我早说过，林彪与“文革”有扯不断的关系。毛泽东对接班人刘少奇失望以后，对中国整个的体制产生不信任情绪，要再来一次“革命”——我说过：毛泽东是一个革命领袖，但很难适应一个执政党领袖的角色；只有革命，才能使他精神焕发，感到自己有扭转乾坤的力量，而在革命转换为建设之后，他有很大的失落感。1949年以后，中共面临的问题恰恰就是要从“革命党”转变成“执政党”，他们这些人本来应该从革命领袖转变成领导人民从事建设的领袖，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，毛泽东不能适应，很有失落感，所以他要连续掀起一些运动，大搞阶级斗争，把革命推向极端。他发动“文革”时不是说过吗，终于找到了一种不断革命的最好方式，不断揭发反革命，七八年要再来一次。

这是最能使毛泽东满足权力欲的，因为转变成执政党，建立了成熟的体制，领袖个人魅力的作用就相对减少。在革命过程当中，需要领袖魅力来产生凝聚力，但是在经济建设当中，更需要依靠的是经济专家、行政干才——美国就是一个好例子：任何人可以当总统，连演员都可以去当总统，花生商也可以当总统，因为体制很健全，在这种健全的体制下，总统个人的权力相对减少，作用也相对减少。

别人都能适应，唯独毛不能适应。在我的书中，一开头就引用了毛的话：我这一生做了两件事，一件是将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，一件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是临终一搏。广义的林彪事件就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展开的。从刘邓倒台开始，到“二月逆流”，到后来一批又一批人的倒台，包括林彪的倒台，实际上都是在这一个模式下展开的，什么模式呢？那就是对“文革”有了不同的看法，产生疑虑，毛就绝对不能容忍。即使是林彪，在认为“文革”已经取得了胜利、该结束了、要将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，也同样不能被毛所接受。

刚才丁先生说到“两个九大报告”之争，我们从现在披露的史料和回忆录看，九大报告确实有两个稿子，林、陈的稿子的重点是“将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”，这与“文革”后重新提出来的“四个现代化”，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？没有。陈伯达在这个时候甚至提出要“以电子工业为中心”，这就直接触动了完全靠“文革”起家、政治利益与“文革”密切相关的人，他们批陈伯达的稿子引用了伯恩斯坦说的话，运动就是一切，目的是没有的，要不停地运动，不停地搞革命。

毛内心并不愿意看到这两派有争议，他确实想将九大开成“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”，把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到底，这两派确实是推动“文革”的两股力量。他为什么要拉住林？因为搞“文革”一定要有军队，没有军队，毛是不会下决心的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包括最后的林彪事件在内，毛也是不愿看到的。为什么？大家回忆一下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“文革”的？就是林彪事件震撼了人们，使人们开始醒悟到“文革”的本质和失败。有的学者写文章谈思想转变说，是以1971年划线，这个事件促使他们去追问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还是亲密战友接班人，今天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？我们都被欺骗了？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。

这种局面，是毛不愿看到的。现在我们也看到史料，毛泽东本人在1971年、1972年生了大病，几乎就没有起来——他再也没有恢复元气。可见这个事件也沉重地打击了他，他绝对没有想到结局竟会如此。他此前跟那么多人斗，他们都是不作抗争，束手就擒，怎么到了林彪这儿，就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儿？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，林彪事件是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。中共很不容易才从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，到现在还很不愿意再去动它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重新评价林彪事件这么难的原因——牵涉的方面太多了，高层政治，评价“文革”，等等，还涉及很多历史纠葛，像这里提到的“四野”的问题，四野与二野、三野的争斗，哪个山头、哪个派，十分复杂，一言难尽。例如，说林彪带着四野的人去整二野三野的人……这也算是“一家之说”吧，但是要问我个人同意不同意这种看法，我会说不同意。

问：林彪事件发生在33年前，对现今和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，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丁凯文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刚才金秋教授已经论述了这种影响，我想补充的是：迄今为止，关于林彪事件，还是官方的标准版说词在主宰着学术界。从1980年底的审判，到后来搞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，邓小平说，“文革”这个东西“宜粗不宜细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要粗线条就好，不要细致地去抠，越抠，就越可能抠出些见不得人的东西：跟毛泽东的关系呀，跟周恩来的关系呀，最好就是粗线条地说一下，历史的解释就变成这样的了：毛泽东发动“文革”，出发点好的，要防止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的“社会帝国主义”国家么；但是，被

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利用了。

毛会被他们利用吗？这个说法能不能加以证实？是谁在利用谁？毛发动“文革”是想打倒刘少奇，他不是达到目的了。官方说：毛泽东是好人办了错事，而办事的人呢，对不起，你们是坏人——好人是犯错，坏人是犯罪。

不知道各位是否看过图们、萧思科两个人写的《特别审判：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》这本书，书中写了，在审判之前，参加整理案卷的人说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，林彪、江青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，都要拿出证据来啊，否则怎么审？于是就看材料。一看，发现每一件事都跟毛有关系——打倒罗瑞卿，跟毛有关；打倒刘邓陶，与毛有关；打倒杨余傅，跟毛有关；还有林彪的“五一八讲话”……每一件事，都与毛有关！

那么怎么解释这些事？拿到彭真那里，彭真说话了：毛是犯错误，林彪、江青是犯罪！（众笑）实际上这就是帮毛、周掩盖。对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干，就人为地采用两种不同的标准：周恩来干的，就是违心的，“只好这么干，不干不行了”么；林彪干的，就是存心的，是处心积虑地搞反革命活动。他们竟用这种双重标准来评价人物、解释历史！到了邓小平那里，他更说“宜粗不宜细”，说讲一下就好了，将全部罪行都归结到林彪和江青头上去，毛与周就都被开脱了。

这种说法显然是说不通的，我编这本书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打破这种说法，要通过重审林彪，也重新评价毛泽东，还有周恩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责任。

问：林彪死党、几个大将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，后来遭遇怎么样？你作为吴法宪的后人，回国发表言论有没有受到限制？对于你研究林彪，有何反响？

金秋：“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”其实后来是“黄、吴、李、邱”，大家都知道，中间那个“叶”，叶群，就在林彪飞机上，一起摔死了。黄、吴、李、邱后来在特别审判中，都被判有罪，判刑十六年到十八年，到1989年、1990年前后都刑满释放了。中央划了块圈，哪个人指定到哪个城市去生活。我父亲被指定到济南——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划到那儿，就是那么划定的。

刚开始对他们审判的时候，参与审判的人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、搜集审判罪证，这些情况在图们、萧思科所写的书中有很生动的反映，他们连续写了三本书，刚才丁凯文先生讲到了一本，另外还有两本，写得很详细：怎么定审判标准，用哪些材料……等等。参与审判的人觉得，这实在太难了：哪些是犯错误，哪些是犯罪？当时的报纸上实际上也说了，黄、吴、李、邱与林彪要“南逃”、“另立中央”，与“出逃”与“五七一”，都没有关系。当时只有我们这些家属，比较关心的人，才会看到《人民日报》第四版的右下角两行字，所以我们也心里明白。

但是“文革”总是需要有人负责的，没有人负责总不行，怎么向人民交代？总要揪出几个人来吧？那就是这些人了，所以对他们定罪、判刑都很重，“组织反革命集团罪”“迫害罪”等等。不过实际对待上，审判是一月份结束的，四月份就开始放人，用什么名义放？就用“保外就医”：这些人年纪大了，保外就医。到了七、八月份，通知我们家属到划定的那个圈去，中央专案组、地方上和我们家属，三方面组成安置小组。像我们就去了山东济南，上级规定，吴法宪在济南市可以自由活动，但不许出济南市，如果要出济南市，要向中央打报告申请。到1988、1989年，刑期满了就正式释放了。

这么多年来，给我父亲就是发生活费，不过我父亲很满足，他感谢山东省和地方政府对他

的照顾。

现在几个人当中，“黄”（前政治局委员、总参谋长黄永胜）已经去世了，他是被划圈划到青岛的，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太好，让他去个好一点的地方，但他还是在1983年去世了；“邱”（前政治局委员、总后勤部长邱会作）也在2002年去世了。现在是我父亲和“李”（前政治局委员、海军司令员李作鹏）还在世。李作鹏是这些人中身体最好的一个，我父亲就差了，已经住医院住了三年，去年抢救了一次，气管切开插管。他实际上已经“病入膏肓”了，如果要我们家里来负担这些医疗费用，我们是绝对负担不起的，所以父亲和我们感谢当地政府的照顾。

凤凰卫视“鲁豫有约”节目三个星期以前分两次播出了采访我母亲的节目，每次45分钟。他们是到家里，采访了四个小时。我并没有看到，但据说国内有些反响，凤凰卫视在国内少数地区能看到。

我本人是做学问的，我只想对历史负责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回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，包括我采访没有受到阻碍。我在国内一些大学和中央级别的研究机构都讲过，虽然都是小范围，是作为学者交流情况，得是博导一级的学者才能参加呢，今天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用中文演讲。当局总不致于连让我从事历史研究的胸怀都没有吧！我每次回去，美国朋友倒是都替我担心，说“有风险”，可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怎么做。何况我也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了！（众笑）做也是这样，不做也是这样么，做了至少还能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说说话——也得亏我的英文还比较好，在这里还能做些事。

问：谋杀毛泽东阴谋究竟是否存在？如果存在，为什么军人集团没有放一枪一炮？难道慑于毛泽东的威望不敢动？

丁凯文：当局在审判林彪集团的时候，最重要的的一条罪状，是他们会谋害毛泽东，罪证就是林彪在（1971年）9月8日写的那一个手令：盼照立果、宇驰颁布的命令办。

当局说，这就是林彪下的命令，要林立果组织小舰队去暗杀毛泽东！但查了这么多年，官方到底拿出来什么证据没有？最多只是说在小范围内，林立果几个人之间议论过，要驾飞机去干，或者拿个炸药包。说到底，也就是几个人坐在屋子里讲的这些话，有没有真的去准备炸药？有没有真的去准备枪支？什么都没有！根据他们讲的这些话，就作为罪状，而且是这么重的罪状，说“林彪要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”，这在法律上能不能说得通？也没有证人能说“九八手令”就是林彪写的啊。我看过这个影印件，我认为不是林彪手迹。而且手令的话说得这么含糊：“盼照立果、宇驰颁布的命令办”，什么“命令”？“办”什么？是吃顿饭的命令，还是上哪儿玩的命令？所以，关键的问题是，能不能用这么一个模糊不清的字条就可以在法律上给人定罪为“搞政变”？

林彪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？他考虑方案会非常细密。如果要策划政变，那就得一、二、三、四——比如你们看他的一号战备令，多么明确：部队应该怎么调动，怎么准备……搞政变就更是这样了，兵从哪儿调来，在哪里部署……他会只写一张小小的纸条，就发动一场政变？现在就凭这么一张小小的纸条，就说他要“搞政变”？

所以我认为，根本不存在“林彪指使林立果去谋害毛泽东搞政变”这回事。有可能是林立果本人，血气方刚，看到毛泽东整到他老爸头上了，觉得咽不下这口气，他看到彭德怀、刘少奇这些人老老实实，被关起来，最后都被整惨整死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，就在自己比较信任的几个人中间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。这样，就被专案组定了谋害的罪名！

问：金秋教授，你说林彪事件促成了百姓觉醒，毛大病一场。那么毛在逼林的时候，是否想到怎么收场？你认为怎样的结果才是毛最希望的呢？从“亲密战友”到非打倒不可，这里好像没有容忍的余地。

金秋：我个人认为，毛确实不想看到林彪事件最后这样的结局，他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虽然我不能断言到底毛是怎么想的——这需要很多材料——但是我的推测是，毛想看到林彪出来做一个检讨。你可以看到1949年后中共高层政治的这个模式，研究每一个人，包括刘少奇、包括邓小平、包括周恩来，研究他们与毛的关系，都可以看出这个模式：毛是个帝王式的人物，一旦与这些人发生分歧，他们就做检讨——我们知道，周恩来是最会做检讨的：“主席呀，我要检讨一下……”（众笑）其他人的书面检讨也是很多的。

这是从红军时代开始的过程：不知经过多少年，把毛泽东推上了全党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。这其实是全党的问题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是全党把毛一步步捧起来的。而毛泽东被捧到了这个位置，他回过头来就利用自己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全党。有个学者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：“文革”是什么？“文革”就是毛泽东一个人打倒了全党。（掌声）

毛所期待的林是怎么样一个结局呢？那就是：林要出来作个检讨，让毛泽东有个下台的台阶。马上就要开九届三中全会了，毛在南巡的时候已经讲过，要解决林彪的问题。怎么解决呢，我个人猜测：林彪做个检讨，以“身体不好”为由，下台。林彪的名字离“文革”太近了，又是毛的“亲密战友”“接班人”，中共党章从来没有写明党的领袖的“接班人”，林彪是第一次被写入了党章。毛拼命要保“文革”，如果要像过去整刘少奇的办法来整林，把他定为“大反革命”，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让他这样退下来就算了，引起的震动较小。

我个人研究的结论是，这是毛想看到的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竟发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，改变了林彪的命运，改变了所有受林彪事件牵连的人的命运，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。历史有时是受必然性制约，但有的时候是受偶然事件促成。我说过，林彪事件是个突发事件，它可以这么发生、这么结束；但是如果要按照历史稳定发展的逻辑来说，按照所有相关人的行为模式向前予以推断，它也可以不这么发生、这么结束。然而，它毕竟就是这么发生、这么结束了。

问：林彪在“文革”几年前就大力吹捧毛泽东思想，这对于“文革”的发生有什么关系？林彪与军队各个山头的老师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丁凯文：这个问题，刚才金秋教授已经予以论述，我想补充的是林彪1959年取代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之后，突出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，但是林在同一时期也做过很多其它的事情，例如军队的建设，国防建设，加强解放军战备，还比如1962年打赢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等。现在大家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林吹捧毛上，好像他只做了这一件事情，对他做过的其它事情视而不见。

我建议大家看一看《重审林彪罪案》书中王年一教授与何蜀及陈昭先生合写的一篇文章：《林彪是“文革”当中特殊的逍遥派和观潮派》。他们对毛、林在“文革”初期的关系以及林在文革中的表现，有极为独到和深刻的论述。我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。

王年一与何蜀及陈昭指出，在“文革”初期林实际上并不积极，而是被动的。毛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，前半截林彪根本没来参加，在大连养病。试想，如果他那时知道自己成了“接班人”，他不应该不来参加会。毛写了《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端出了刘少奇的问题，这种情况下，刘少奇一定要打倒了，谁来取代他做毛的接班人呢？当时副主席有周恩来、有林彪，当时周恩

来连夜用飞机将林彪接到北京开会，毛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直接将林的名字放到他的后面，这样将林突出出来了，林彪才开始以毛的接班人的形像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林并不是主动者。

毛打倒刘少奇，林彪也并没有很深地卷入。江青搞《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》，说来说去，是毛要搞的，由江青出面，最后毛本人将纪要的题目改成“林彪同志委托江青”搞的，等于是把林彪拉进“文革”的行列中来。林在这件事上也是被动的。

既然毕竟上了这辆车了，林彪怎样自保呢？以前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，以“接班人”的形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，他紧紧抓住实权，经常主持各种中央政治局、各种工作会议；而林彪成了“接班人”之后呢？他基本上不露面，几乎不主持中央工作会议，凡事能推就推，能拖就拖，能躲就躲，不建言，不负责，主席画圈我画圈，主席同意我同意。他吸取了刘少奇的教训，那就是不跟毛发生冲突，你同意了我才同意，这样就很安全。“文革”中很多事情，例如打倒刘少奇，打倒彭罗陆杨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北京市委书记彭真，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，“文革”初期最先被打成“反党集团”），贺龙的倒台，杨余傅（杨成武、余立金、傅崇碧，几个重要将领，1968年被突然打倒）的倒台，林应该说是有责任的，但是林到底要负多大的责任呢？是不是像中国当局所说，林要负主要的甚至是完全的责任？

至于林彪与军队各个山头的老师的关系，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，“文革”初期林彪与这些老师的关系，非常好，包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叶剑英，林与他的关系也非常好。“文革”初期叶剑英在很多场合的讲话中，对“林副统帅”吹捧得非常之高。我在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文章中也写到，当时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这些老师，并不像官方所说的“抵制了林彪”。

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：林彪与叶剑英的关系是非常之好的，而他们对于军队不卷入“文革”动乱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现在只提叶的作用，而不提林的作用，可是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不经过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林彪，自作主张，自行其事，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。事实上，林彪是叶非常坚定的支持者，所以叶才敢于在前台，与搞乱军队的“中央文革”面对面拍桌子斗。没有林彪在后面鼓励和默许的话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现在官方的材料讲毛泽东说，你们不要再提“二月逆流”了，这是老师对林彪、对王关戚他们去的。这完全是撒谎。实际上林彪就是叶的后台，官方要将责任推到林彪头上，才这么说。老师们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的，知道整他们的是江青而不是林彪，并不存在林彪与老师的尖锐对立。现在应该将事实讲清楚。

问：毛泽东当时整林彪，却无从“下口”，很棘手，所以南巡，寻找机会。“九一三”事件爆发了最好的下台台阶——林说过，我以我的死来成全毛泽东。

金秋：对这个说法，我基本上同意。对林彪事件，我还有一个看法。如果把“文革”这段历史研究透的话，可以看出林彪倒台也不是偶然的。从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事态发展看，他的倒台是必然的。

这里面有个原因，国外“文革”研究者指出，九大以后一个重要现象是军队掌管了大权，在各行业掌管的权力，不成比例。当时从中央全会，到各省市的“三结合”革命委员会，都有“军代表”。从国家机器、政权机构来讲，这是很畸形的一种现象，与国家政权的组成不相吻合。

军队是怎样介入“文革”的呢？说起来话很长了。刚开始林彪也是不愿意军队介入“文革”的，后来毛强行发表“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”，要军队“三支两军”即支左（支持左派），支工（支援工业）、支农（支援农业），军管，军训。那时天下大乱，唯一一个毛还能调动的力量，就是军队——我前面说，他一定要把军队抓住，否则他是不敢冒这个险的——这时他只能把这个责任交给军队，动用军队来整顿、恢复全国的秩序，实现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。但是军队这么一步一步介入“文革”，在各级政权中如此不成比例地掌管权力，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。到了九大以后，军队的势力和影响就要一点点萎缩，一步步地从政权中退出来。如果从这个框架下来看（不同的框架会有不同的认识），“九一三”就提供了对军队清洗的最好借口。此后好几年连总参谋长的职位都一直是空着的，直到邓小平出来以后，1975年担任总参谋长。军队大伤元气，空军就不要说了，整个被陆军接管，整个空军大院处级以上基本上就端掉了。

军队要从政权机构中引退——这是必然的；用什么方法引退——这是偶然的。这也是“广义的林彪事件”与“狭义的林彪事件”的区别与联系。

还有一个在林彪事件中空五军的问题，这涉及“大舰队”“小舰队”的指控，与林立果有关了。当局为找出一些罪证，把林立果和一些朋友们曾经议论过的问题翻出来。但是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所谓“小舰队”？别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鲁珉，当时的空军作战部部长，林立果是作战部副部长。我后来与鲁珉有过很多接触，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惜。他是抗美援朝的英雄，还有人写过他的事迹，他打仗最多，很英勇，立了战功，是这样提拔上来的，那时年富力强，人也非常好。后来也是因为林立果在他手下工作，所以“九一三”之后，自然而然就成了“小舰队”成员，被审查关押了很久，开除党籍，开除军籍，等等，多年没有工作。他是当时空军最好的飞行员啊！还有三十四师长胡萍，给周恩来开飞机的，是当时技术最棒的，就因为受牵连、被打击，一直到现在，他也是病情严重，长了脑瘤压迫视神经，双目失明。当时这些人都是百里挑一，千里挑一。

我父亲病重的时候，当年那些警卫员、秘书、司机、厨师都来看我父亲，见到他们我心里真是太难过了，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罪？当时能给空军司令员开车，都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，千错万错，错在给我父亲开了车、做了饭，当了秘书、警卫，结果呢，不能说是“家破人亡”吧，却也是被整得很惨，很惨。

如果说我关心林彪事件有“政治”目的的话，那无非就是想给他们说说话——中国的政治斗争太残酷了！

问：林立果在北戴河要林彪乘坐飞机逃走，是林彪安排的还是被动的？

丁凯文：从我接触到的资料来看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无论林彪走，还是不走，都没有好下场。我曾经接触过林彪的一个秘书，他对我讲过：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，林彪和手下都看过监管人员的报告，知道刘死之前的凄惨情况。这些报告只给中共非常高层，可能只有政治局常委看。刘这么凄惨的下场，是一个前车之鉴，现在毛南巡了，毛沿途讲话的调子，比毛要打倒刘的最初阶段还要高得多了。1966年毛批刘还仅仅是说派工作组派得不对，还没有说刘是“反党集团”，要“篡党夺权”呢。而现在毛南巡中那些话，图穷匕现：“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”，“是第十次路线斗争”，这就摆明了：你林彪就是我的敌人，我下一步就要动你了。你向我夺权，你的下场会比刘少奇好吗？

设身处地站在林的位置上想一想，他不能不认为自己很可能就要落到刘少奇的下场，那种状况谁不害怕？被关押，被审讯，被折磨，像刘一样凄惨死去……怎么办？刀架到脖子上了，三十六计，跑为上啊。

林当时说过，我就是两条路，一个是从容就义，一个是坐牢。我推测，林当时想：我豁出去了，我就在北戴河呆着，哪儿都不去！林立果和叶群就说，我们能跑就跑吧，不管到哪儿，广州也行，苏联也行，只要能跑掉。9月12日毛回到北京，那时他们可能已经六神无主，突然又有人报告说，山海关机场被人封锁了，没有周恩来、黄永胜等四个人的同意，飞机也不能动了，他们就更慌了，这时一片混乱，该拿的东西没拿，该叫的人也没叫，飞机该加满的油也没有加满，林彪当时已经吃了安眠药要睡觉了——你们想，要搞政变的人，会躺上床睡觉？——千钧一发的紧张关头，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跑！跑了再说！再晚一点可能根本就跑不成了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八三四一部队追的人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，对着林彪的“大红旗”还开了两枪，都打在“大红旗”的后玻璃上。连警卫部队都对首长、本来保卫的对象动手了！他们慌慌张张飞上天，又没有领航员，又没有通讯员，连副驾驶都没有带上，盲人骑瞎马，上去还容易，可怎么下来？就只有机长一个人呢。再说，你往哪里飞？

我们现在分析，他们当时首先想跑，至于跑到哪儿？哪儿近、安全，就去哪儿。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最后飞机是中了导弹，还是发生了机械故障，飞机最终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。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事！

还可以指望的是，飞机上还有一个黑匣子。如果能把这个黑匣子找回来，听一听他们最后在飞机上说了些什么，对于彻底揭开林彪为什么出走的谜底，应该是有帮助的。

问：有两个关于领袖性格的问题，一个是关于毛的性格：毛是否患了焦躁症？一个是关于林的性格，是否能从林的性格特点联系看林彪出走的必然性？

金秋：关于领袖性格，在国外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。你们有人或许看过、或许听说过《病夫治国》这本书。还有人探究领袖个人在成长中受到条件限制，当他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，会出现什么情况；长期与实际情况隔绝，又会产生什么情况。在我的书里，试图用“老年政治学”的观点，来分析“文革”产生的原因，以及为什么“文革”初期阶段是红卫兵运动。这些东西讲起来很复杂，但是如果我们身边有七八十岁老人的话，有些疑问是可以解开的。

他们这些领导人非常有智慧，但是人年老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，每个人从五六十岁到七十岁，都会有很大的更改，怎样看自己，怎样看今后，怎样面对死亡，这是很痛苦的心理挣扎，寿命越长，成就越大，到了老年，失落也就越强烈。老人的这种失落感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再给他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就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现在国际学术界研究毛泽东的人，将早年毛泽东和晚年毛泽东截然分开——“文革”正是他晚年的问题。

问：重新研究“文革”，重新研究“九一三”，是否与历史、客观地研究中共内部的斗争和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有关？

金秋：林彪事件有很多研究角度，可以说明很多问题，包括高层政治，体制问题。他们这一代人——我们先不说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谁应负什么责任——应该说是长远的研究课题，像毛、林、周，都会长久地被研究下去。

问：如果飞机没有掉在蒙古，如果林彪没有死，会怎么样？（笑）

丁凯文：这是一种假设，研究历史不能从假设出发——如果毛与林没搞“文革”会怎么样呢？

不过这个问题既然提出来了，好，我这么想：如果林彪真跑掉了——飞机飞到蒙古或者苏

联平安降落了，林彪没有死，那么，这对于中共政权将是极大的震撼。这是由于林彪的地位所决定的，林彪与王明不一样，王明早就被排除在中共核心圈之外了，长期在苏联治病；而林是在位的，他已经被毛泽东塑造成“亲密战友”“接班人”“副统帅”，连毛的“副统帅”都要跑到苏联去！苏联当时可是被中国看成“敌对国家”的，这对于中国的党，对于中国人民，都将产生爆炸性的影响，对政权将产生重大冲击。

问：请讲讲“七千人大会”，讲讲林彪是否接受彭德怀倒台教训，以及在“文革”中为什么林无论如何也要维护毛？

金秋：我们想研究毛他们这一代人，要从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研究，要琢磨透，毛在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究竟是什么位置？

我长期以来想过“反毛”的问题。我认为，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基本上丧失了“反毛”的能力。他们中如果有谁有“反骨”，恐怕到建国的时候也就没有了。

这些人为什么维护毛、把毛看成至高无上的领袖？这是一个历史问题，我在书中也探讨过，毛在这些人心目中实际上代表党，他是党的个人化身。反对毛，就意味着反党。要这批人去主动地、彻底地反毛，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。

丁凯文：我看到八月六日《世界日报》有一个报导，题目是《林彪行宫探秘》，林彪的所谓“行宫”“704工程”，被当成林彪反毛泽东的重要证据，说林彪在杭州搞这么一个工程，目的是要“反毛”。这扯得上吗？但是这种说法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在杭州，一提到“704工程”，谁都这么说。我到杭州去玩，导游带我们走到那儿，就对我们说，这是林彪建的行宫。林彪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如果说是行宫，建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？当时何止在杭州给林彪建，在广州，在湖南……给毛泽东相应地建了住所，是为了预先提防苏联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，如果苏联用原子弹轰炸中国，中国这些重要领导人才能够有藏身之所，才能够在这里发号施令。所以所谓“704工程”根本不是所谓要搞政变，策划反毛，实际上是为了战备。

为什么这些无稽之谈辗转重复，被当成林彪“反毛”罪证？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，这实际上是为了政治需要，编造出各种罪名。从中共建国以来，为什么搞了这么多的冤案？从镇反、三反五反，肃反、反右、反右倾到“文革”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？实际上，就是政治需要。如果是根据事实，是不会这样的。

问：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的真假到底如何？在发现这个纪要的地方据说还找到了林立果的身份证，当局是否有可能伪造证据，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地无中生有了一些东西？

金秋：有些东西可以伪造，我不能完全排除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，但我认为，确实可能有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这么一个东西。

《解放军报》邵一海写过很多书，出过“林彪王朝的黑幕”“林彪王朝覆灭记”这两本书，是最早的记录林彪事件的，书中有“一个带拉链的笔记本”章节，写得很详细。在哪里发现的呢，是“九一三”以后，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。因为林立果很久没有回这个楼，他们很奇怪，进去打扫卫生，就发现了这个带拉链的笔记本，里面记载的就是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。然后层层上报，一直报给毛，连毛都不太相信是林彪的“政变计划”，尽管他不信，但是用它来做林彪罪行的反面教材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他下指示原文发出来。我们记得，这个文件传达下来，是在1971年11月底。

不管这个东西是真还是假，有一点可以确认：它与林彪出走没有关系。如果有关系，它应该是在出走之前发现，而不是出走之后。不能说它算林彪是“畏罪潜逃”的一个罪证。它到底是谁弄的？现在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是空军党办的秘书程洪珍写的，一种说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于新野写的。我在研究林彪事件时，注意到李伟信（就是当时与于新野几个人一起说“一二三”自杀，但是没有打死自己的那个人），他是空四军政治部一个干事，与林立果他们关系密切，他后来写了供词。我特别注意到，包括他在内的这些所谓林彪事件当事人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说自己看到过这个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。李伟信的证词中只是说，我听说于新野要搞个东西；听说这个东西送到首长叶群处。后来就将这两个事联系到一起了！不过就是李伟信也只是听说，而没有看过这个东西。我找到一些当事人，问他们“五七一”，他们说：“五七一”？是不是在哪里盖房子的工程？

我估计可能是有“五七一工程纪要”这么个东西，不太可能造这么个恶毒的一个文件，但是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？我在文章中用了很长的一段剖析这个“五七一”，可以说它是“反革命政变”的草案，但是仔细研读，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部分说到“政变”部署，真正涉及的兵力，连中国民航都算上，不过三四个师。大部分篇幅是在进行政治批判，“政治绞肉机”，揭露“文革”的黑暗。

丁凯文：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见过这个东西，好像只有死了的人才见过。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东西，是不是可以拿来作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？恐怕从法律的角度来讲，是站不住的吧？

金：大家一定听累了吧！感谢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兴趣，来听我们的演讲。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扑朔迷离，所以有人对我说：金秋，你搞什么历史啊，改行写惊险推理小说算了！（众笑，鼓掌）

（全文完）

~~~~~

## 【史海钩沉】

### 极左的中共“九大”

• 迟泽厚 •

1969年4月1日至24日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#### ◇ 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令境外媒体有些惊讶

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“九大”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，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，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。

出席“九大”的代表未经过选举，是由各级革委会“党的核心小组”推荐决定的，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，很难对群众保密。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，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，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，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，随时准备出席大会。

参加“九大”的代表分住在北京饭店、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。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。各宾馆警卫森严，大门紧闭，代表一律不准外出；室内电话全部撤消，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，晚上须拉上窗帘。

大会于4月1日下午举行。20世纪60年代，人民大会堂四周平时遍布岗哨，不准群众接近，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，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。现在，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，要想不让外界察觉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。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：

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，每车45人，定车定人，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。

登车前，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，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，车门面向宾馆，刚好挡住大门，车刚停稳，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，代表们迅速登车，此后每隔三四分钟，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。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，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。

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。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，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，距离不到一公里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。但为了掩人耳目，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，向东开到东单，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、西大街西行，再右转北新华街，兜了个大圈子，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，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。

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，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。

当晚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，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“九大”开幕的新闻时，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一些外国通讯社、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，或发表评论，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。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，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。

毛泽东的讲话不断被口号打断，仅留下649字的讲稿

大会于17时开始，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。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，共176人，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。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？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，于是举手通过。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、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。这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：“什么人合适呀？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，大声说：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！”

毛泽东又说：“林彪同志当主席，我当副主席，好不好？”林彪站起来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，大家同意请举手！”

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，林彪高喊：“通过！”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，接着是高呼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声。

毛泽东接着说：“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，赞成的请举手！”

代表们再次举手，鼓掌。

毛泽东又说：“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，赞成的请举手！”代表们又举手，鼓掌。毛泽东高兴地说：“好，通过！”

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，毛泽东致开幕词，口号声此起彼伏，讲话二十几分钟，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。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。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，一喊就是一串，不能中途停下；有人领喊，大家就得跟着呼喊，而且要喊出精神来，不然就是缺乏“阶级感情”。会场的气氛却对毛泽东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，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，不得不草草打住。最后，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。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。

◇ 十个党内“反对派”如果不选，他们“可能坏得更快”

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“反对派”，或曰“对立面”的问题。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：陈云、朱德、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聂荣臻、叶剑英、陈毅、徐向前、邓子恢、张鼎丞。但是，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。他说：“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。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？你反你的嘛！”毛泽东还说：“如果不选他们，可能坏得更快。他们不改怎么办？地球还不是照样转！”

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，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，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，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，促使他们转化。为此，各代表团受领任务：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“对立面”的票，落实到“人头”。

4月23日下午，进行正式选举。到会代表1510人，仅有2人请假。

分两次投票：毛泽东以全票当选。林彪获得1508票，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，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，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。周恩来获得1509票。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，虽然只少了8票，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X的人，却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的危险。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，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。

10名“对立面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：朱德809票；陈云815票；李富春886票；陈毅867票；徐向前808票；聂荣臻838票；叶剑英821票；邓子恢827票；李先念922票；张鼎丞1099票。

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：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、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，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。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，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，而他自己又不懂谦虚，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，得票惟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！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：“你比林副主席还能！”

□ 摘自《炎黄春秋》

~~~~~

【史实辨析】

不应有的遗忘

• 何 蜀 •

季羨林先生在为马识途“文革”回忆录《沧桑十年》一书所作的序言中，充满忧虑地说：“我现在痛苦地发现，浩劫结束才不过二十来年，今天再同年青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，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，认为我们是谈‘天方夜谭’……照这样下去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走的人越来越多，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，再过上十年八年，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‘天

方夜谭’。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，性命白丧失了，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。”

近来在阅读中，竟意外发现，不仅是青年，甚至在老一辈的“文革”过来人中，也对“文革”历史产生了不应有的遗忘。

这样的例子，先是在《随笔》1998年第6期上李国文先生的《小人礼赞》一文中发现的。

李国文这篇文章说，中国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过“小人”们不间断的作践，心理与生理都得到了充分锻炼，因而增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，并总结说：“当代小人的贡献，就在于对中国作家的磨练，使他们具有了好好赖赖能熬过来的坚强，实在是功不可没的。”

为了说明这一论点，李先生却举了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例子，说：“这个结论是根据外国作家自杀率较高，而中国作家相对要低的比较中得出的。”李先生还举出了茨威格、海明威、杰克·伦敦、叶赛宁、马雅可夫斯基、法捷耶夫、川端康成、芥川龙之介、有岛武郎、三岛由纪夫等一批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，说中国作家在“文革”期间，“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，受不了凌辱而跳湖、而开煤气，结束自己的生命外，没有人写绝命书，没有人尝试过自杀，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。”

这样说，就未免太离谱，太有悖史实了。

中国作家在“文革”十年中的自杀者，果真是只有“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”吗？当然不是。笔者仅从极为孤陋的见闻中，即查到有这样一些作家在“文革”中含恨自杀的资料：

邓拓（《燕山夜话》作者，诗人、杂文家、新闻工作者），1966年5月18日服药自杀。

叶以群（文艺理论家），1966年8月2日跳楼自杀。

老舍（小说家、剧作家），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。

陈笑雨（文艺理论家），与老舍同日，投河自杀。

傅雷（作家、文学翻译家），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上吊自杀。

陈梦家（早年著名“新月派”诗人，后为古文字学与考古学家），与傅雷同日自杀。

白辛（作家，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编剧），1966年9月服毒自杀。

杨朔（散文家），1968年8月3日自杀。

周瘦鹃（著名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，散文家），1968年8月12日投井自杀。

李广田（散文家），1968年11月2日投池自杀

闻捷（诗人），1971年1月13日开煤气自杀。

……

仅从这个极不完备的名单即可看出，中国作家在“文革”十年中远非只有“一两位老先生”自杀。假如再加上那些死因尚存某些疑点但通常被认为是自杀的作家，如小说《红岩》作者罗广斌（1967年2月10日“跳楼自杀”）、小说《敌后武工队》作者冯志（1967年“上吊自杀”）等，人数就更多了（今年《炎黄春秋》第二期上赵淮青《文化界逝者的风骨》一文，就是针对李国文此文而作的，详述了许多文化界名人自杀的情况，但赵文“为尊者讳”，未提李国文先生的大名）。

对照这些血淋淋的历史篇章，再来看看李国文先生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：“除了极少数的一两位老先生……没有人写绝命书，没有人尝试过自杀，甚至连这个该死的念头都不曾有。”不能不令人困惑。难道李先生在“文革”中和“文革”后都是“桃花源中人”，对中国作家曾经有过

的遭遇竟会如此陌生？

李先生为了证明外国作家自杀的比中国作家多，一口气举了十来个自杀的外国作家为例，似乎确实比他所说的中国作家中自杀的那“一两位老先生”要多得多。其实，仔细一想，这种比较法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。让我们看一看李先生所举的那些外国作家自杀的时间吧：

杰克·伦敦，1916年（服麻醉药过量而死，通常被认为是自杀）。

有岛武郎，1923年。

叶赛宁，1925年。

芥川龙之介，1927年。

马雅可夫斯基，1930年。

茨威格，1942年。

法捷耶夫，1956年。

海明威，1961年。

三岛由纪夫，1970年。

川端康成，1972年。

可以看出，李先生所举的这些外国作家，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的不同年代自杀的，而且他们分别属于美国、日本、奥地利、苏联等不同国家，分别自杀于亚洲、欧洲、美洲等地。其中，在与中国“文革”十年相同的时间段里自杀的，只有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两位。如果要作比较，应该是以一国与一国，同一时间段与同一时间段相比才合适，才有“可比性”。否则，我们不是还可以把从屈原到王国维、朱湘的自杀者都扯上来凑数吗？

李国文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，竟还写了更加令人惊诧的一段话：“邓拓先生诗：‘莫道书生空议论，头颅掷处血斑斑。’多么慷慨大义！当他为三家村一员，最早推上‘文革’祭台时，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，而做不到杀身成仁。”

邓拓“只能低头接受批斗，而做不到杀身成仁”吗？不知李先生的这一印象是怎么得来的。众所周知，邓拓是“文革”中自杀的第一人，他并非“低头接受批斗”，而确是“杀身成仁”——以死抗争了。而且他在自杀前留下了遗书（并不是像李国文先生所说的“没有人写绝命书”）。这是稍微了解一点“文革”史实的人都会知道的。怎么可以将这“文革”自杀第一例也遗忘了呢？

另一则同样令人大为惊诧的“文革”遗忘症的例子，是在一本好书中看到的：《带翅膀的摄影机——侯波、徐肖冰口述回忆录》，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“口述传记丛书”中的一种。这套丛书是很不错的。然而，如白璧之瑕，在侯波、徐肖冰这本书中，出现了一个实在令人想不到的错误。

在回忆到杨尚昆那一段（《无微不至杨主任》）中，竟把杨尚昆的被打倒说成是因为他给毛泽东录音而“被江青、‘四人帮’紧紧抓住不放，而且添油加醋”地说成是对毛泽东搞“窃听”所致，甚至还冒出来这样一句话：“杨尚昆被‘四人帮’揪出来以后……”（见该书246页）

这才真是“天方夜谭”了。杨尚昆是被谁打成搞“窃听”，被谁“揪出来”的？众所周知，“彭、罗、陆、杨反党集团”是“文革”第一大冤案。这一冤案，是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授意定下来的。出席这次会议的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（“四人帮”当时还无人有资格与会），主持这次会议的，自然更不是“四人帮”，而是后来被“文革”打倒的“头号走资派”刘少奇。杨尚昆被“揪出来”

时，根本就还没有“四人帮”（江青等四人尚未进入中央领导层并结成帮派），“四人帮”中的王洪文那时还只是上海一家工厂保卫科的普通基层干部，连听这个中央高层会议精神传达的资格都没有。

这一例比李国文说邓拓“做不到杀身成仁”那一例更为令人不解。因为作为作家的李国文，有可能完全不知道邓拓自杀的事（尽管另一作家袁鹰写邓拓自杀前后情况的散文《玉碎》曾脍炙人口广为流传，选入多种书中，但李先生完全有可能没有读到过）。而侯波是在中南海里担任摄影科科长，是杨尚昆的直接部下，应该知道当时是谁把杨尚昆“揪出来”的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误记？

我很难相信这是出于遗忘。会不会是整理者太年轻，不了解当时情况而在整理时写错了？但是，据说一本书的出版，还要经过编辑以至总编的“三审”。难道审读这本书稿的人都弄不清楚当时情况？

遗忘，不仅会使一些历史事实不能得到正确的陈述，而且会影响到对历史教训的总结、吸取。

李国文《小人礼赞》一文中将许多中国作家没有在“文革”中自杀的原因归之于经受了“小人”磨练而增强了承受力。“小人”只是传统文化中与“君子”相对立的一个不甚明确的概念，一般泛指品质恶劣见利忘义之徒。用来指代在新中国的“革命”政治运动中充当“革命动力”的某些人物，未免有些欠妥。这个概念不能说明为什么在50年代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会有那么多人“响应号召”积极投入。说他们是“见利忘义”吗？他们许多人确是为了“利”，但这是为了“党的利益”，“革命的利益”，“无产阶级的利益”，这个“利”与“义”（革命大义）已合二为一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久经考验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反脸无情相互揭发批判，才会有至亲骨肉划清界限“大义灭亲”……须知，那些运动都是“以革命的名义”进行的，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。那些充当“革命动力”的人物，自然有的是属于个人品质不好（但从“革命利益”的需要来看却是很好、很可贵、很值得提倡的），但这类人只能说是少数甚至“极个别”，相当多的“革命动力”们（甚至包括许多被当作“革命对象”受到批判折磨的人在内），却是在“革命”的召唤下错用了自己的热情，其中有的也只是像某些大人物一样不得已“说了违心的话”。

今天人们都已了解很多了，有些在“文革”中受到批判的作家，在“反右”时就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；有的在“反右”时受到批判的作家，在“反胡风”时也曾无情地批判过别人；还有在解放初期即受到批判的作家，在延安时期也曾无情地向被诬为“托派汉奸”的王实味打过棍子……能说他们都是“小人”吗？何况，这一次次越来越“革命”的政治运动，都是并非由“小人”，而是由属于“伟大”一级的大人物发动起来，在“捍卫无产阶级专政”、“保卫社会主义”等堂而皇之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，仅仅归罪于“小人作祟”，“浮云蔽日”，显然是不恰当的。

巴金在《十年一梦》一文中如实写下了他在“文革”初期诚恳接受批判时的心态：“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，别人大吼‘打倒巴金’！我也高举右手响应。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不大好理解。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，我真心表示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，重新做人。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。我甚至因为‘造反派’不‘谅解’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。”巴金还总结说，他当时甘心承认自己是一个“精神贵族”，实际上已成了一个“精神奴隶”。这对于许多中国作家在“文革”中没有自杀的原因，恐怕比“小人”磨练说更有代表性也更深刻吧？

现在看来，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年轻人对“文革”的无知了，还得加上过来人的遗忘。这

更说明，许多有识之士一再呼吁的加强“文革”研究，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，确是十分必要的啊！

□ 原发表于《山西文学》2001年2期

本期编辑：	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	《CND》总编：
华新民（美国）	思语（美国）	陈天寒（美国）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-8602

投稿专用地址：hxwz@cnd.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cnd-cm@cnd.org

如需有关《CND》和《华夏文摘》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，获取

中文文件：hxwz-info@cnd.org 英文文件：cnd-info@cnd.org

《华夏文摘》万维网服务站（WWW）地址：<http://www.cnd.org/>
